

暨南史學叢書

广东会馆论稿

刘正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会馆论稿/刘正刚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6

(暨南史学丛书)

ISBN 7-5325-4361-7

I. 广... II. 刘... III. 会馆公所—研究—广东省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0238 号

暨南史学丛书

广东会馆论稿

刘正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4 字数 306,000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7-5325-4361-7

K · 838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前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 序

广东属禹域极南之地,自昔为海上交通枢纽。汉代合浦徐闻即为往印度洋航路出口障塞,《汉书·地理志》记之详矣。暨南大学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取《禹贡》“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为名,用意至深。故魁然为侨校之首。创校以来,一贯以发扬中国传统、传播世界先进文化为职志,于推动历史研究,更不遗余力,早在1928年即有历史学系之创设。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执教之名历史家先后崛起岭表,何炳松之于史学理论,周予同之于经学史,丁山之于商周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均树立风声,为暨大史学奠定扎实研究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教学重点之扶持,史学队伍更为坚强活跃,陈序经、陈乐素、朱杰勤、金应熙辈,于宋史探索之深入,东南亚史、华侨史、港澳研究诸领域之开拓,蔚为重镇,于史学界中更别开生面。

近时暨大计划出版一系列“暨南史学丛书”,除刊布专著,并辑录近几年来暨大学人在国内外发表有代表性之论文,系中同仁来书要我写一序言。暨大在史学园地的成就,因地缘关系,特别朝向中外与港澳之关联及岭南人文活动等主题,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自有它的特色与传统。至于新的课题,若“南海神庙之历史”及“阿剌伯人与南海船”等专门研究,尚待推进,为岭南文化史填

补缺口,正是大家迫切期待的工作。港澳地区之历史学由于暨大史学研究工作成果之带动,彼此之间唇齿相依,更能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自不待言。因不辞畛陋,欣然而乐为之序。

饶宗颐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前 言

会馆是明清以来建立于通都大邑的地缘或业缘的社会组织,一般均拥有自己的建筑物,作为办公或联谊活动的场所。会馆,狭义是指同乡公建的建筑物,广义则指以建筑物为活动中心的同乡组织。其功能,诚如北京的惠州会馆所云:“联络乡情、敦睦桑梓。”^①最早的会馆就出现在北京,是在京的同乡仕宦与赶考举子的重要活动场所,一般称之为试馆。近年来,会馆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②一些会馆建筑陆续被各地政府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政府对其进行修葺,使其发挥独特的历史文化功能。如建于嘉庆十二年(1807)的北京湖广会馆,是目前北京仅存的建有戏楼的会馆之一,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3月,北京市宣武区决定按湖广会馆原有格局进行修复,1997年6月修复工作结束,并全面对外开放。是年9月,北京湖广会馆作为北京市第一百座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宣布成立,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鲁丽及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各级领导等出席了揭匾仪式。^③

① 叶恭绰题词,见《北京岭南文物志》,北京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1954年编印。

② 《中国旅游报》,1995年12月18日。

③ 北京戏曲博物馆编:《湖广会馆》,1998年刊印。

北京的广东会馆也有多处被列为北京市各级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如粤东会馆、东莞会馆被宣武区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南海会馆、中山会馆则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素有京师门户之称的天津市,1907年广东人在此兴建了广东会馆,该会馆的主体建筑歌舞台为伸出式舞台,造型十分独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等曾在此献艺。1912年孙中山、黄兴等在此登台演讲。1986年1月,由邓颖超同志题名的“天津戏剧博物馆”挂牌成立,馆址就在天津的广东会馆内。^①伴随着老会馆发挥余热的时候,一些以会馆命名的商务或文化团体机构,在新时期也络绎不绝地出现于都市之中。^②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学界对会馆的关注。

那么,究竟如何为会馆下定义呢?业师杨国桢教授认为:“会馆是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张、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形成整合流动社会的功能和机制,既是明清社会变迁的产物,又为传统社会结构的更新起了一定的作用。”^③杨先生不仅指出了明清以来会馆形成的社会经济大环境,而且还透彻地揭示了会馆的功能。明清时期,人口频繁的迁移与流动,使得人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必然要分享别人的社会资源,不可避免会产生诸多矛盾;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着远离故土的情感折磨。正是出于保护自己、协调和解决在新环境中出现矛盾的心理需要,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倡议下,民间

① 天津戏剧博物馆编:《今日天津——天津戏剧博物馆》,刊印年月不详。

② 《中国旅游报》,1995年12月18日。

③ 杨国桢:《序言》,见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往往自发而踊跃地捐资建立乡谊性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在明清时期的会馆中,除了少部分的会馆组织是业缘外,绝大部分都是以乡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地缘会馆。会馆大多制定有规章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聚会、娱乐、演戏等社会活动,所有同籍乡人都可以参加会馆举办的社会活动。会馆各类活动开展的成功与否,是检阅同籍乡人在异地凝聚力强弱的一个重要表现,活动的成功举办,既可以提高同籍乡人在异地的社会地位,又可以使身处异地的同籍乡人感受到乡情的温暖。依此看来,会馆是流动人口在异地他乡相对集中活动的一个重要联谊据点。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会馆也是检索人口流动异地的索引。也就是说,只要某地有某某会馆的建立与活动,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该地就有某某地域人口的临时性或永久性的活动,乃至最后有人定居的事实。

明清以来的会馆都有固定的建筑物,建筑物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无一例外地都会摆放着家乡先贤的神像。会馆建立的经费大多由同籍乡人集体捐助,它其实已成为流动人口在异地他乡的一个象征物。会馆建筑物的崇宏壮丽往往成为移民在异地力量大小的象征,因会馆多以地缘关系而建立,所以在早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晚清以来,会馆经过长时期与所在地社会的磨合,其服务也由原先的封闭不断走向开放,即由起初单纯为同乡服务到不断地为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也正是在这种服务中,以会馆为代表的流动人口对所居地逐步产生认同感。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各地会馆自建立以后,始终没有忘记对原籍故土眷恋的“草根文化”情结。会馆的拜神祭祀活动,都带有明显的故土文化气息,这种气息通过会馆所举办的各式文化与社会活动,代代传承。所以,尽管晚清以来,会馆的服务功能在发生变化,但人们的桑梓之情依然存在。

对于会馆史研究的学术评价,福建青年学者王日根教授在其大作《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的“绪论”部分,已有详细论述,此不重复。这里仅从与本书关联较大的角度回顾前人的已有研究成果。

会馆史的研究至少在 20 世纪初已经开始。研究者的目光都着眼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讨论,后来又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相联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80 年代。由于会馆史研究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框架中进行,因此,大多数学者都将会馆归入工商业行会范畴进行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全汉昇先生在 1930 年代出版的《中国行会制度史》。^① 作者在分析明清行会时,所用标题即为《会馆》。也就是说,他把明清时期的会馆组织完全当作中国行会组织发展程序中的重要环节加以讨论。这一时期为了配合学术界的研究热潮,还出版了数部地域性工商业发展的碑刻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会馆珍贵碑刻。^② 其深层背景,笔者认为编者仍是将各地的会馆等同于工商业行会组织。直到 1990 年代,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彭泽益先生还搜集整理出版了《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③收录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工商会馆资料,成为今天学者研究会馆、行会等的重要参考文献,贡献甚巨。

对会馆史研究关注较早、贡献最大,且有独到见解的,当数何

① 《中国行会制度史》,初版于 1935 年,台湾食货出版社,1979 年再版。

②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 年;《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 年;《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③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 年。另有《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

炳棣先生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会馆史论》，^①该书利用大量的地方志资料、会馆志以及海关调查档案等文献，不再简单地将会馆等同于工商行会，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将会馆分为试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大类，并具体探讨了各类会馆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何氏指出，会馆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其地域观念有日渐消逝的趋势。何氏大作自出版以来，直至今日，仍是海内外学者研究会馆或基层地域组织的必备参考书。何氏对会馆性质或种类的三分法，也越来越为后来的多数学人所认同。^②

近年来，对于会馆的性质问题，人们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实，不管是哪种性质的会馆，在明清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中，都难免会沾染商业气息。笔者曾注意过明清北京的广东会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北京不仅工商会馆具有典型的商业行为，而且试馆和移民会馆也带有明显的商业气息。^③因此，对会馆的研究不应该以偏概全。应该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整合中，会馆等基层社会组织摆脱不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内涵，但往往又有所创新，绝对地或孤立地看问题，都不是一个学人应有的态度。

对会馆史的研究，人们一直比较重视大范围、大视角的宏观研究。王日根教授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即是较成功的代表作，他不仅研究了国内的会馆组织，而且还将目光聚焦于海外华人会馆的构建与发展，指出会馆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母体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

① 《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

② 如吕作燮的《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和《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即持此观点。

③ 《明清北京广东会馆的价值取向》，《暨南学报》1998年第2期。

一步完善与创新。会馆基本上满足了同乡人在外籍寻找乡情依托的需要,为同乡人在外部世界的生存与奋斗提供了团体力量的资助。王教授的论断,进一步发展与充实了会馆史研究的理论,拓宽了会馆史研究的框架。

近年来,一些学人已不满足于会馆研究的大而全的做法,试图从地方史和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开辟会馆研究的新思路。汤锦程先生于1994年出版的《北京的会馆》,^①是笔者所见的第一部论述地域性会馆的著作。然而这部著作无论在学术观点还是在史料引用等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缺陷。^②而在同年出版的另一部由胡春焕、白鹤群合著的《北京的会馆》一书,^③在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给研究北京会馆提供了较详细的资料,尤其是作者对北京会馆实地调查所得的许多第一手资料,更加珍贵。该书不仅对今天北京各区县的会馆分布进行考察,而且将全国各省在北京建立的会馆加以认真的排比与考证,使我们对明清以来北京的会馆有较全面的了解。学界对北京会馆的关注,也引起了政府有关方面的注意,“九五”期间,北京市档案馆针对人们对会馆的重视以及研究的深入,组织各方面力量,集中整理编纂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并被纳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④全书字数达120万左右,可谓是鸿篇巨制的会馆档案资料。书中将明清以来全国各地在北京建立的会馆管理章程、财产、碑记、楹联、会议报告以及北京市有关会馆管理的法令等档案加以辑录。该书的出版不

① 汤锦程:《北京的会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

② 华道强:《一部粗制滥造的“著作”——评汤锦程的〈北京的会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④ 《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

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对抢救北京这一特有的文化遗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有计划地开展自己所在区域的会馆史研究,河南学者王兴亚教授的《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①全面考察了河南境内的商人团体以及这些商人团体在河南主要通都大邑建立的商业会馆。作者将集市、庙会与会馆联系起来,考察明清时期河南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作者认为直到清末,河南会馆的总数不少于200所,基本属于由异地商人以籍贯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商业会馆。近年来,伴随着“潮州学”研究热潮的展开,有关海内外的潮州会馆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上海学人周昭京先生的《潮州会馆史话》,^②书中内容几乎囊括了海内外的潮州会馆以及潮州人以会馆为中心所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凸显了明清以来潮州商人在各地商业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是一部通俗易懂的乡土教材。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全书20万字,竟没有一条资料来源的出处,也没有参考文献书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学术价值。对潮州会馆研究贡献较大的另一位上海学者郭绪印先生,根据档案、报章、文集等资料,连续发表了《“一·二八”期间潮州旅沪同乡会的抗日救国活动》^③、《上海潮州帮与孙中山的关系》^④、《上海潮州会馆的成立与章程、制度》^⑤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深入讨论了上海潮州会馆自清前期成立以来,在上海乃至在中国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关头的选择。广东

① 《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潮州会馆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③ 《潮学研究》第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④ 《潮学研究》第2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⑤ 《潮学研究》第5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学者蔡鸿生教授以苏州现存清代潮州会馆碑记为主线,探讨了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蔡先生在文中阐述的文化双向交流影响是以前学者所忽视的。^① 上海不仅有潮州会馆,还有广州、肇庆人建立的广肇会馆,上海学者宋钻友先生的《上海广肇公所——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一文,^②是近年来研究上海广肇会馆难得的一篇好作品。宋氏的观点诚如副题所言,就是以广肇公所为例,讨论传统社会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的功能。作者认为,民国以后,广肇公所在很大程度上已从组织和职能上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移。公所工作重心由维护本帮商业利益转移到为全体同乡服务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广肇公所团结同乡、加强自治、改变同乡移民群体的无序状态,对上海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广肇公所又称广肇会馆,上海学者张忠民先生发表《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一文,重点考察了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在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功能,这之中当然少不了广东会馆。作者指出,有清一代,上海会馆公所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不断扩大。19世纪上半叶之前,会馆公所对于地方事务的贡献,主要局限于对地方公益事业的物质捐献。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传统地方政权管理能力的弱化,会馆公所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日渐上升,会馆公所的头面人物成为地方自治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③ 在对广东会馆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川胜守先生第一次将明清时期北京、苏州、上海的广东会馆放在一篇文章中进

① 《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潮汕文化论丛》初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收入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③ 《史林》1999年第2期。

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明末以后到清前期,广东人在北京、苏州、上海之会馆活动,领先于其他各省商人。这是北京等地对以南海贸易为背景的广东物产需求以及广东与这些城市的距离决定的。^① 广西学者陈炜、侯宣杰等则着重分析了明清以来广西地区的各省会馆情况,其中较多地描述了粤商会馆对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②

明清时期,广东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走在全国的前列,广东会馆因粤人在海内外的活动也遍布各地,诚如1931年《广州广西会馆报告书》中称: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人口“客外者,不独有省组织之会馆,更有一县或数县合组之会馆,……会馆之多,闽广人甲天下矣”。^③ 然而,学术界对广东会馆的研究,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而在大视角的会馆研究中,又往往会涉及广东会馆的一鳞半爪,不能给人一种总体上的印象。

明清时期,我国通过海洋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广东地处沿海的独特地理条件,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势。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央政府实现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更为广东商帮的经营活动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广东得天时、地利之便,

① 川胜守:《明清时代的北京、苏州、上海之广东会馆》,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92年。

② 陈炜:《明清时期粤商会馆与广西民族经济的发展》、《商人会馆与民族经济融合的动力探析——以明清时期广东会馆与广西地区为中心》、《近代广西境内的商贾》,分别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2期、《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侯宣杰:《论会馆与清代广西社会的互动变迁》、《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分别载《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4期、《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

③ 原件藏中山图书馆之孙中山文献馆。

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广东商帮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广东商帮也因此名闻遐迩,具有岭南特色的广货与外国进口的洋货,也一同随着广东商帮而风靡海内外。广东商业会馆也随着粤商的商务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在全国各通都大邑建立起来,成为粤商在异地经营商业活动的重要活动场所。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刺激了人们迫切要求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读书应试也促使广东人口的社会流动不断加快。为了各地举人进京赶考的需要,广东人在北京兴建了大量的试馆,这些试馆又都带有明显的商业价值取向。明清时期广东巨大的人口压力,又促使粤人不断外出求生存、求发展,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清代粤人向四川的移民即是例证,广东移民会馆也应运而生。所有这些在异地他乡的粤籍同乡,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广东方言晦涩难懂,粤籍同乡为了营造互相支持的需要,按照当时流行的习惯,建立以乡谊为纽带的同乡会馆已成必然。

从明清时期粤人的不同地理移动和社会流向来看,粤人建立的会馆兼有工商、移民、试馆三类。这些会馆都建立在通都大邑,而工商、移民会馆甚至会建立在繁华的乡村市镇之中。从这个层面看,会馆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或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是一地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中心地,也是人口的高密集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对城市发展中房地产业的支持,其次是以会馆为中心所举办的具有浓郁家乡风情的文化活动,丰富了所在地社会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会馆往往是人们集会、联谊乃至互通信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商人堆放货物的主要场地。会馆除了主体建筑用来祭祀神灵或演戏外,无一例外都有大量的附产,这些附产主要用来出租或经营商业活动。会馆的各类活动在更广的范围内将中国的区域市场、地方风土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反过来

又促使了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人口流动的活跃。会馆在传统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功能,不仅保护了同籍乡人在异地的利益,而且也维护了所在地的社会安定与发展,并通过人口的频繁流动传递了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信息,促进了我国区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胡德平指出:“会馆通过行规,为商人提供制度保障和有关市场交易及各地方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在保护商人利益、反对不正当竞争方面,会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①今天,以会馆命名的一些场所又开始在某些都市出现,虽说时代不同了,但性质总有相似之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我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轰开,沿海地区的一批口岸城市被迫开埠。广东商人利用这一特殊的时机,开展商业活动,买办这一被近代赋予特殊意味的群体,在开埠初期基本上被粤人包揽。李吉奎先生在《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②中指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在上海,近代买办的活动中心也在上海,并由此伸展到全国各地。由于地缘关系,近代买办又分成许多帮,其中广帮是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大帮,并且曾经是居首要的大帮。对广东籍买办在开放口岸城市的活动,美国学者郝延平有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广东人特别擅长茶叶生意,外国洋行雇佣他们在福州、上海、九江、汉口和日本为买办。唐茂隆在广州老买办莫仕扬的推荐下出任过福州买办,在福州从事茶叶采购。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琼记、旗昌、怡和、宝顺等大洋行所雇佣的买办中,除上海外,明

① 胡德平:《导言》,见周均美:《中国会馆志》,第8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

② 《学术研究》1999年第12期。

确为广东籍的买办,基本上分布在各个通商口岸,如福州琼记洋行买办唐茂隆、阿启,怡和洋行买办阿甘、阿林;九江琼记洋行买办阿明、梁南记、阿童、阿超,宝顺洋行买办徐渭南、郑济东;汉口琼记洋行买办协隆、刘绍宗,旗昌洋行买办阿彭、协隆,怡和洋行买办裕隆,宝顺洋行买办盛恒山、杨辉山;天津宝顺洋行买办徐子荣,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①而这些口岸无一例外都有广东会馆的建立。广东买办在这些口岸城市的生活,往往会带着家乡的亲朋好友同往。所以,会馆的建立与买办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联系。尤其是买办身份的特殊性,也为商人在这些城市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

晚清以来,随着新式商人团体商会的兴起,粤人凭借自己的商业实力,在各口岸城市的商会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会会董往往由当地商业实力较大的商帮组成,这些商帮又与当地的同乡会馆关系密切。1918年11月,上海总商会中有广帮会董2人,分别为鹤山的劳念祖、香山的唐元湛;1920年9月有广帮会董5人,分别为高要的汤富礼、南海的黄其恕、香山的冯培禧、南海的简寅初、南海的简照南;山东烟台商务总会的广帮会董有大埔的张文濂、潮阳的范绍颜、香山的杨枝、新会的陈焕康。福州总商会特别会董有广东新会的陆建章。九江总商会会董则有广东潮阳的郭秀开(怡成钱号)、南海的陈盛桂(广吉洋货号)、香山的唐虞俊(谦顺安茶栈)。景德镇总商会会董有广东番禺的陈邦庆(顺记福瓷号)。安徽蚌埠总商会会董有广东香山的麦兴。湖南常德总商会会董有广东大埔的邬鹤年(致中和药房)。重庆总商

^①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62、91、109、287—2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会董有广东新会的黎遇春(古冈公广货药材)。而在广西的总商会中,广东商帮均占有相当大比重,甚至占绝对多数。^①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热情更为炽热,这仍以广东人为主流,所有的活动又几乎离不开广东会馆。早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在北京以南海会馆、新会会馆为根据地,联络、鼓动维新变法人士,掀起民族救亡图存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连民国的创建者广东人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也多次与会馆发生联系,北京的粤东会馆、天津的广东会馆、上海的潮州会馆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②而在与各地会馆尤其是广东会馆的接触与交流中,孙中山先生已意识到会馆所蕴藏的力量。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孙中山住处粤秀楼,孙中山离粤经香港抵上海。1923年1月,滇、桂军联合起来将陈炯明驱逐出广州,并致电孙中山回粤主政。孙中山南下前就预计到奠定南方局势的稳定需要解决财政和军饷问题。2月9日,他特致函上海潮州会馆,全文如下:

潮州会馆诸董先生钧鉴:

民国变乱,十载于兹,其间牺牲之大莫过于我粤,言念及此,殊可痛心。

去夏,文欲冀传统之完全恢复,整军北伐,甫奏肤功,不料陈逆炯明顿怀异志,阻我义师,功败垂成,深堪痛恨,甚至纵兵淫掠,所过皆墟,粤省繁华,顿归寂寞。文忍无可忍,不得已电

①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册,第783—89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 乔素玲:《试析孙中山先生与会馆的关系》,《近代中国》(台湾)2002年第146期。